

论北朝鲜卑文化的历史作用

导师 缪 钺（四川大学教授） 作者 吕一飞

魏晋南北朝是继春秋战国之后我国古代第二次民族大融合时期，也是我国古代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民族融合。故近世治魏晋南北朝史者，莫不重视这一时期的民族融合问题。

关于历史上的民族融合，马克思曾指出：“依据历史的永恒规律，野蛮的征服者自己总是被那些受他们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1卷，第330页）这就是说，在民族融合过程中，文化较低的民族最终将被文化较高的民族所同化，这无疑是中外历史上民族融合的主流。

但是，世上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如果倒过来考察，人们不禁要问：民族融合是一个错综复杂的过程，犹如长江大河，有主流，也有迴流，而文化的作用和影响，也并非都是单向进行的。那么，在民族融合过程中，文明程度较低的征服者民族的文化，对文明程度较高的民族及其文化又将产生何种作用 and 影响呢？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曾深刻指出：公元五世纪，野蛮的德意志人入侵罗马帝国后，给垂死的欧洲注入了新的生命力；他们使欧洲返老还童的，决不是沙文主义者所虚构的那样，德意志种族有一种天生的魔力，而只是他们的野蛮状态，他们的氏族制度而已。恩格斯这一观点，富于启发性。它表明：落后的征服者民族的文化，对于先进的被征服者民族来说，并非

全是破坏和消极的东西，在一定的条件下，尚存十分积极的历史作用。我国魏晋南北朝的民族大融合中，是否也曾发生过这样类似的历史现象呢？这无疑是一个十分有意义的研究课题。

魏晋南北朝的民族大融合，主要发生在北方黄河流域。自洛京倾覆，司马氏南渡，史称“五胡”的鲜卑、匈奴、羯、氐、羌等少数民族，相继崛起，割据中原，建立政权，成为统治民族。及至杨隋建国，一统天下，其间共二百八十年（公元307年——589年），经过长期错综复杂的民族斗争与融合，北方各少数民族（包括长久居统治地位的拓跋鲜卑）皆基本融合于汉族之中，被汉族先进的经济文化所同化。这一过程，即史家常说的“汉化”。这无疑是魏晋北朝民族融合的主流。

但是，这一时期的民族融合，并不仅限于汉化一途。北方胡族文化对汉族及汉族文化的作用和影响，亦是历史的客观存在，不可忽视。对这一历史现象，本文姑沿用史家之旧词，简称为“胡化”。又，北方诸胡族文化的作用和影响，并不尽相同，有大有小，未可等量齐观。“五胡”之中，鲜卑最为活跃，故这一时期的“胡化”，主要即为鲜卑化。魏晋北朝的鲜卑化，以拓跋氏统治的北朝为甚，所以本文以此为讨论的重点。

本文所谓的鲜卑化，包含两个内容：

第一、从种族角度考察。自永嘉之乱，五胡长期迭据中原，经过世代的变迁，岂无胡化之汉人出现？史载十六国时北燕君主冯跋及北齐之开国者高欢，皆为鲜卑化之汉人（参《魏书·海夷冯跋传》、《北史·齐本纪上》）。

第二、更着重从文化角度考察，即从鲜卑文化对汉族文化的作用和影响来考察。在数千年中华民族文化发展进程中，中原地区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汉族文化与北方草原以畜牧经济为基础的少数民族文化两者之间，有异同，有冲突，更有相互渗透，相互融合，不断地使中华民族文化得到更新与充实。北朝时，塞外的拓跋鲜卑入

主中原，遂将其文化带入黄河流域。在错综复杂的民族斗争与融合中，鲜卑文化对汉族传统文化之冲击、渗透，以至于融合、充实的作用，表现得尤为显著。及至杨隋统一，李唐继之，朝气蓬勃，文教昌明，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其所以致此之故，虽有多端，而北朝文化（尤其是鲜卑文化）的影响，实为不可忽视之事实。虽然，北朝时期民族融合的主流是汉化，但若就某一具体时期而言（如北齐和北周），就某一局部地区而论（如北魏后期的北边州镇），这种鲜卑化现象所占地位很重要，给予当时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生活的影响甚大。

晚近之治魏晋南北朝史者，注意力多集中于汉化上，而对胡化（鲜卑化）则稍嫌忽略，因此，在北朝民族关系的问题上，所见不够全面。这是我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上一大缺憾。故笔者不揣浅陋，草撰此文，以期引起史学界同仁的重视和讨论，促进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深入发展。

最后，有必要强调指出：魏晋北朝民族大融合的主流是汉化，在这一总趋势的影响制约之下，完全鲜卑化的汉人，毕竟是少数；而北朝鲜卑文化对汉族文化的作用和影响，从总体来看，也仅是局部和有限的。所以，北朝的鲜卑化，在普遍意义上，只能理解为一种倾向。对这种历史现象，忽视或夸大它，均有失偏颇，应客观地实事求是地予以评述。

一、拓跋鲜卑文化的性质及其基本内容

北朝一代，拓跋鲜卑为统治民族，故北朝的鲜卑文化，主要即鲜卑拓跋部之文化，自无疑义。我国古代北半部地区，实划分为两个文化地域：蒙古草原属于北方草原文化区，其特征是畜牧经济兼以射猎，原始氏族制或夹杂着浓厚氏族制残余的奴隶制度，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原始文化；黄河流域属于汉封建文化区，其特

征是农业经济，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政体，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封建文化。这两种文化，均为中华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秦汉以降，中原汉族与北方少数民族之间，长期既冲突又交融，究其实质，乃是这两种文化的冲突和融合。此二者之相互消长，又可分成两个阶段。秦汉时，汉封建文化发挥了优势，取得辉煌的胜利，两汉对匈奴的巨大胜利和对西域的控制，便是明证。故这一时期，汉封建文化的影响日渐向周边地区扩展，声威远被阴山内外，天山南北，辽河上下。但是，汉封建文化影响之扩展是有条件的，它需要统一强大的中央政权和繁荣的封建经济为后盾。有了这个后盾，中原汉封建文化的影响便不断向周边地区扩展，一旦丧失这后盾，影响便减弱。东汉季世，宦官专政，朝纲败乱，极大削弱了中央集权政府。严重的土地兼并，使大批农民丧失土地，农业经济陷于破产。黄巾起义失败后，豪强割据，战祸连年，中央政府瓦解了，社会生产遭到空前的破坏。继后的曹魏、西晋，皆立国短暂，保塞安边尚且不暇，更无力向外经营了。所以，自东汉后期以来，中原封建文化对蒙古草原的影响日削。与此同时，北方草原文化却再度兴起，象解除了压力的弹簧，迅速恢复了原状，重新控制了蒙古草原。

古代我国北部大漠，活动着许多少数民族，匈奴、鲜卑、乌丸、高车等，即其中的著名者。汉晋以来，大漠南北，变动频仍，各族兴衰嬗递，杂处错居，乃至相互交融，民族融合的情况极为复杂。然而拨其烦细，究其大端，其发展演变之概况，亦可略而言之。秦汉时，匈奴最为强盛，故蒙古草原的民族融合，呈现出一种匈奴化倾向。东汉以降，形势大变，匈奴日趋衰弱，鲜卑取而代之，故从东汉中期延及魏晋，草原上的民族融合，渐折转为鲜卑化倾向。恰在这时，拓跋鲜卑迁抵阴山南北。

作为一个蒙昧初开的远方部落，拓跋部所带来的一切，如他们原始的氏族制度、畜牧兼射猎的生产方式、娴熟的骑射技艺、

古朴的风俗、粗犷豪健的民歌舞乐，无一不带有北方草原文化的原始成分。但拓跋部顺应潮流，大量融并其他各少数民族于自身，促进了草原各族鲜卑化之进程；同时，在文化上又吸收了各族文化的若干成分。这一过程，既是以拓跋氏为核心的草原各族的大融合过程，又是以鲜卑文化为主导的各族文化的融合过程。故后世概称为拓跋鲜卑文化者，既有其独特性，又颇具代表性，实乃当时再度兴起的北方草原文化的一大代表。

拓跋鲜卑文化的基本内容，即它的氏族制（甚至还保留有浓厚的母系氏族遗风）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各种观念形态。毋庸讳言，拓跋鲜卑文化中固多杂有原始落后的诸种成分。但如果一分为二地考察，其中亦不乏若干刚健、质朴、生机勃勃的因素：

第一、尚武精神；

第二、部民之间的人际关系较为平等互助，尚存原始社会的古朴遗风；

第三、崇尚实际的质朴精神；

第四、妇女的社会地位颇高。

这些都与魏晋南朝士族上流社会中那种鄙薄武事，崇尚门阀、溺于玄虚以及轻视妇女的风气，形成强烈的对比。

总之，当拓跋鲜卑初抵蒙古草原南部之时，实乃一蒙昧初开的部落。但正因如此，他们还未受到文明的污染，尚未产生汉封建文化中某些腐朽的成分。换言之，在拓跋部原始野蛮落后的文化之中，正包含着人类社会健康发展所必需的某些积极的因素，而这些因素在当时的汉封建文化之中，或业已丧失，或正在丧失。笔者以为，此点实为全面正确理解魏晋南北朝民族大融合的关键之一。

二、北朝的鲜卑化倾向与北朝政治的关系

拓跋部入主中原后，其文化遂与汉封建文化发生长期的冲突，

给予北朝政治以重大影响。其发展变化的阶段如下：

（一）北魏前期削除鲜卑旧俗的斗争。该时期内，两种文化的冲突，主要表现为鲜卑部落大人制与封建专制皇权的斗争，而终以后者的确立告一段落。这意味着北魏政治生活中，汉封建文化的影响扩大了。

（二）北魏中期的汉化运动。这一时期，两种文化的冲突渐趋深入，又终以汉封建文化的胜利告一段落，前者可以崔浩事件为代表，后者则以魏孝文帝全面的汉化运动为标志。缪钺先生曾指出：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在处理民族关系上，一方面讲“夷夏之防”，另一方面又主张“用夏变夷”，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以华夏的高度文化影响落后的少数民族，使其进于文明之域。

（《略谈五胡十六国与北朝的民族关系》，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四川省社科院出版社1986年版）。这种思想曾普遍为十六国及北朝仕于胡族政权的汉族士人所承继，且特重“用夏变夷”，以为安身立命的精神依据，崔浩即其中的突出人物。崔浩是清河郡人，为北方第一高门。他颇具才智，历仕道武、明元、太武三朝，备受宠任，但晚年却惨遭杀身灭族之祸。崔浩之遇祸，主要是因他“大欲齐整人伦，分明姓族”（《魏书·卢玄传》），即欲区别士庶，建立魏晋以来的门阀政治。笔者以为，崔浩此举，一方面诚欲提高汉族士人的地位，另一方面又实包括鲜卑贵族在内，即欲以门阀制度来同化其人，用夏变夷，造就一个新的鲜卑门阀集团，与汉士族结合起来，共同统治，如后世孝文帝所作的那样。但崔浩失败了。鲜卑脱离氏族制为时尚浅，素无门阀观念，故不能容忍等级森严、士庶悬隔的门阀制度的束缚，至于鲜卑贵族，恐怕主要是反对抬高汉士族的地位，他们不能容忍除开他们本身之外，尚别有汉族贵种。故鲜卑颇仇视崔浩，后借“国史”之案，将他杀害。

崔浩死后四十余年，他所致力的“用夏变夷”理想，不料竟

由魏孝文帝亲自来执行。全面的汉化运动开展起来了，迁都改俗，轰轰烈烈。鲜卑贵族也被门阀化了，与汉士族高门结合在一块，共同统治，新的门阀政治终于建立起来。北魏孝文帝确是古代少数民族中一位有远见卓识而又有毅力的人，在古代民族融合互相促进的历史过程中，其杰出功绩是应充分肯定的。但是，孝文帝汉化运动的主要失误，即全面恢复魏晋以来的门阀政治。须知汉封建文化之中，并非一切皆好，尚存腐朽成分，门阀政治即为其一。门阀政治的实行，虽在融合胡汉上层分子方面，可收一时之效，但却遗害匪浅，它使鲜卑平民和汉族寒微颇遭压抑，身份日沦，怨愤倍增，北魏末鲜卑反汉化潮流之勃兴，与此关系甚切。此或即“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之谓欤？

（三）北魏末年鲜卑化潮流的勃兴。孝文迁洛以后，北魏境内逐渐形成南北两个截然不同的地域。洛京地区，汉化日新。而以旧都平城为中心的北边州镇，却不为汉化所濡染，形成一个鲜卑化地区，不仅鲜卑旧族依然故我，就连部分汉人也逐渐鲜卑化了。陈寅恪先生曾指出：“北朝汉人、胡人之分别，不论其血统，只视其所受之教化为汉抑为胡而定之”（《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故北朝汉人鲜卑化与否，主要视其所受之教化如何。不过，还须强调一点，北朝民族融合的总趋势是汉化，在这个强大趋势的影响和制约之下，彻底鲜卑化的汉人，毕竟是少数，多数是染上一些鲜卑习俗而已；因此，我们所谓汉人之鲜卑化，在普遍意义上，只能理解为一种倾向，一种在一定程度上濡染鲜卑习俗的倾向。这样，即使鲜卑化较深的人，也可能保留着某些汉族的特征，这就不足为怪了。北边州镇鲜卑化的汉人，多出自寒微，其后贵显，又多假冒中原名族，固不足信。北魏丧乱，六镇兵起，此辈遂乘乱崛起，分属高齐、宇文周两大集团。

北魏末鲜卑化潮流之勃兴，以契胡尔朱荣制造的河阴屠杀为标志。孝文以后的汉化运动暂入低潮。嗣后，北魏政府王纲解纽，

分裂为东、西魏。东魏为高氏所代，是为北齐，西魏为宇文氏所代，是为北周。

（四）高齐、宇文周的鲜卑化倾向。《魏书·天象志四》东魏孝静帝天平二年条“天象若曰：王城为墟，夏声几变……是后两霸专权（按此指怀朔镇鲜卑化汉人高欢和武川镇鲜卑化匈奴人宇文泰），皆以北俗从事。”高齐的鲜卑化倾向，有如下表现：恢复鲜卑旧制、旧俗，盛行鲜卑语；兵民分离，以鲜卑制汉；代人为党，排抑汉族士人。宇文周的鲜卑化倾向，有如下表现：恢复鲜卑旧制、旧俗，盛行鲜卑语；恢复鲜卑姓氏及赐鲜卑姓；创立府兵制。宇文周与高齐同样推行鲜卑化政策，且宇文周之所作为，远逾于高氏。但高氏因之而败，宇文周却藉之而兴，其原因何在呢？史载，高氏以鲜卑制汉，专以欺凌汉人为事，而山东汉士族的势力颇大，故每与鲜卑发生激烈的冲突，胡汉分裂，互相争斗，政治浊乱，国力日削，乃至内部之相残未已而国家已临倾覆。宇文氏的鲜卑化政策，其目的乃是使胡汉打成一片，而以鲜卑部落之制为归依（宇文氏政策还表面仿效周礼，意在笼络汉族士大夫）。这一方面巩固了鲜卑的社会政治地位，另一方面又使汉人的地位略近于鲜卑（如赐鲜卑姓，就使汉人仿佛成为鲜卑的同宗，非复异姓之后）。且关陇汉士族力量较弱，实不足以与鲜卑相抗。故宇文周政局稳定，国力日强，终能混一中原。看来，在处理胡汉关系上，宇文氏的确棋高一着。

三、北朝的鲜卑化倾向对士族高门的影响

魏晋之际，地主阶级划分为士族地主与庶族地主，并形成士族制度。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士族制度经历了由盛而衰的过程。在北方，士族高门之由盛而衰，原因固有多端，但鲜卑化势力对士族的沉重打击，则是重要原因之一。众所周知，士族制

度在政治上最大特征，即以门第选官，以贵承贵，以贱袭贱。拓跋部兴自塞外，素无门阀观念，徒以戎马定王业，武功平中原，其升迁仕进，多由军功，故北魏前期的选官制度，多任鲜卑劳旧。及至孝文迁都变俗，建立门阀政治，北魏选官制度为之大变，皆以门阀取士。然而门阀选官之制，却激起南北鲜卑武士（多为寒人）的切齿痛恨，遂触发了孝明神龟二年汉士族张彝被羽林虎贲殴伤致死事件。朝廷迫于形势，制定“停年格”，不问士之贤愚，一律按年资选官。门阀选官之制，遂致搁浅。这是北魏选官制度之又一大变。高齐之世，代人为党，排抑汉士族，虽崔暹、崔季舒、杨愔、祖珽等先后辅政，皆欲遵门阀选官之制，拔擢士人，但仅收暂时之效，终告失败。宇文周之世，选举不论士庶，官职不分清浊，史有明文，无待赘论。故自北魏后期鲜卑化势力之勃兴，迄杨隋建立王朝，其间六十余年（公元519年—581年），北朝几无门阀选官之制。这也是北方门阀士族逐渐衰微的原因之一。

南北朝时，士族门阀日渐衰微的又一重要原因，即寒人的崛起。在南朝，寒人的崛起，多与寒门将帅相继为帝有关。在北朝，寒人的崛起，则与勃兴的鲜卑化潮流关系甚密。其表现可略而述之：

第一、史载北边州镇的鲜卑化汉人，多出自寒微，其后在高齐、宇文周政权之中，跻身高位，执掌实权。其人数之多，权力之重，南朝寒人与之相较，则望尘莫及。

第二、高齐为了抑制士族，又多拔擢寒人，或参掌机要，或委以重任，如孙搴、陈元康、赵彦深之流，皆是其例。宇文周扶翼寒人、抑制士族之手段，尚有两着高棋，为高氏所不及。其一，改易随贺拔岳西迁有功汉族诸将之山东郡望为关内郡望。此令既下，大批出自寒微的汉将，纷纷借此机会，明正言顺地将其家世改为士族高门的郡望，如李虎、李弼之改称陇西李氏，杨忠之改称弘农杨氏等，皆如此类。这种情况是高齐政权所没有

的。高齐集团中的汉族寒微，即便权势煊赫，也只能通过与士族高门联姻的手段，借以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如陈元康之流）。而宇文周集团的汉族寒微，却可公开篡改郡望，自称名门，与昔日的士族高门分庭抗礼。其二，赐鲜卑姓。据史料统计，宇文氏赐予鲜卑姓氏的诸种人中，汉族寒人占45.8%，士族占35%。此后，昔日的士族高门与寒微，都称为宇文氏或独孤氏等等。对于士族，无异摘掉了其赖以炫耀高贵门第的金字招牌；对于寒微，则大大提高了其社会地位。彼此平起平坐。历代冠冕，无以炫耀；蓬门荜户，不必愧耻。宇文氏此举，实有一举两得之妙用！

北朝鲜卑化倾向对中原士大夫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不仅对门阀制度破坏甚力，而且对士大夫的社会风气、价值观念，都予以深刻的影响。

（一）尚武功、重战事。史载，江左士族专崇文教，鄙弃武事。降至萧梁，此风愈炽，乃至百官不能乘马，猝遇侯景之乱，士大夫非但不能躬擐甲冑，挺身捍卫，就连身家性命，也难自保。文弱如此，诚为可叹。北方士族则与此不同，颇有尚武习战者。而这种现象之蔚然成风，乃在西魏、北周之世。文武并重、不可偏废的新价值观念，逐渐为士大夫所接受。此与宇文周的鲜卑化政策不无相关，亦魏晋以来士大夫观念形态之一大变。

（二）习世务，达政事。江左士族多浮华虚诞，不切事务，任官则不晓政术，治家又不会经营，求诸身而无所得，施之世则无所用，实可谓金玉其外，败絮其内。颜之推为之太息，盖痛感此乃亡国之征。北朝的情况有所不同。鲜卑兴自漠北，性本质朴，注重实际而不尚空谈。观历代君主，多能习世务而达政事，拔擢人物亦以实际才干为准绳，有虚声无实才者，罕见任用。这种风尚对中原士大夫深有影响。故北朝一代，凡委以重任之士大夫，如北魏的清河崔宏、崔浩父子，赵郡李孝伯、李安世，陇西李冲，

高齐的博陵二崔，弘农杨愔，宇文周的武功苏绰，皆以明习世务，练达政事见称。而学业当与济世才干并重，不可偏废的一种新的价值观念，在士大夫阶层日愈普及。此亦魏晋以来士大夫观念形态之又一大变。

总之，经过北朝一代长期的民族斗争与融合，北方士族，特别是关陇集团士族，以新的姿态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文武兼备，披坚执锐，横刀跃马，武勇不减鲜卑，但又不似鲜卑之野蛮无文；执卷吟哦，研讨经史，文雅不逊儒生，但又不象江南儒生之文弱；练达政事，颇有经邦治国之才干，注重实际，一洗浮华清淡之遗风。他们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既有雄心，又有能力，注定要在隋唐历史舞台上演出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一幕。

四、北朝的鲜卑化倾向对隋唐的影响

关于北朝一代文物制度对隋唐各种制度的影响，陈寅恪先生《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一书已阐述甚精，故本文皆无所论及。今仅就以下几个方面，略抒己见。

（一）隋唐之际地主阶级成分的局部更新。

陈寅恪先生曾深刻指出：李唐一族之所以崛起，实与北朝一代的民族斗争与融合密切相关，“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李唐氏族之推测后记》，载《金明馆丛稿》二编）推而广之，陈先生的意见同样适应整个隋唐地主阶级的情况。由于北朝鲜卑的渗透、充实，隋唐之际地主阶级的成分发生了局部更新，其表现如下：

首先，鲜卑和鲜卑化汉人的后裔在隋唐地主阶级成分中占重大比例，出现许多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学者、文学家、艺术家，如繁星之璀璨。如果没有他们，隋唐历史将大为黯然失色。

其次，大批寒人跻身高位，魏晋以来的门阀政治更加衰弱了。

总之，隋唐之际地主阶级成分的局部更新，对整个阶级起到了一种振奋复苏的作用，带来若干新气象。例如唐代朝官之中，才兼文武、练达政事者，层出不穷，其中之佼佼者，多能“出将入相”，御强敌于边陲，揽朝纲于庙堂，文治武功之美，足令后世倾慕。可见隋唐地主阶级，较之魏晋南朝，的确有了令人刮目相看的变化。这种变化的产生，反映了北朝鲜卑化的深远影响。

（二）唐太宗开明的民族政策

在历代封建帝王中，能够较为平等地对待国内少数民族者，实属罕见，唐太宗李世民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人。唐太宗认为：“夷狄亦人耳（按历代封建君臣多把少数民族比作禽兽。太宗不同意这种看法，故有此言。），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仇敌。”（《通鉴》唐纪十三，太宗贞观十八年）他又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

（同上书，太宗贞观二十一年）基于这种思想，太宗认为，君主治理天下，不仅对汉族百姓应实行儒家的仁政，即使对少数民族，亦应实行儒家的仁政。这是唐太宗民族政策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的主要原因。

史载李唐源出鲜卑化的汉人，屡与胡族通婚。这种家世出身，使李唐皇室一方面与少数民族血统有直接的关系，另一方面又与少数民族的文化传统有较深的联系，故大汉族主义对其影响不深，民族偏见比较淡薄。唐太宗之所以具有较为平等的民族思想，并非偶然。

（三）唐代的婚姻、服饰和乐舞

北朝的鲜卑文化对唐代的社会风俗颇有影响。例如婚礼仪式中的入帐交拜、新妇乘鞍、夫婿骑马绕车三匝；婚俗中的收继婚、妇女离婚和改嫁都较容易；服饰的窄袖、襦子、褙子、襦裙、鲜卑

帽、辫发；舞乐的“北歌”、“簸逻回歌”等等，皆为此类。

（四）唐代开放的文化政策

李唐一代，上袭汉魏南北朝的余波，下启两宋的新运，除承继汉族传统封建文化之外，同时采撷外来文化的精英。在吸收外来文化方面，李唐王朝表现出一种特别宽宏开明的态度，凡能为我所用，皆来者不拒，兼收并蓄，并不严守华夷之辨、夷夏之防。这与北朝鲜卑化倾向的影响，亦有相当的关系。北朝长期复杂的民族斗争与融合，造成了中国文化史上一种奇特的繁荣局面：各种类型的文化错综交汇于中原，既互相争斗，又互相融合，百花齐放，争艳竞丽。不同血统、不同出身、不同文化背景的各类人物，皆可于其中择其所好，以资利用。齐、周的统治阶层，多为汉化浅而鲜卑化深的人群，故其价值标准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即不大以汉传统文化之是非为是非，某种文化，只要能投其所好，为其所用，无论是胡抑或是汉，皆可兼收并蓄，并不严守华夷之辨（按有时出于政治目的，又或以汉制之名以文饰其胡制之实）。唐代宽宏的对外开放的文化政策正肇源于此。

五、结论

综观汉晋南北朝时期中原汉封建文化与北方草原文化的两次冲突与融合，最终虽皆以汉封建文化取胜，但影响却颇为不同。秦汉时期，第一次冲突与融合主要发生于长城以北的大草原，其影响虽未可低估，但对汉封建文化自身的冲击却甚小。魏晋北朝，第二次冲突与融合转移至黄河流域，故予汉族的封建制度、封建文化以强烈的冲击，而使其腐朽成分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和抑制。现分述如下：

魏晋以来，汉封建制度中腐朽成分之一，即门阀选官之制。突破门阀选官之制，不拘一格选拔人材，以利于地主阶级统治阶

层的新陈代谢，焕发新机，这是中国封建制度要继续向前发展的一个关键。魏晋以来，历代地主阶级有识之士都尖锐抨击过门阀选官之制，力图冲破它，但始终无可奈何。北朝后期，门阀选官之制终于被突破了。如前所述，这一突破实与北朝的鲜卑化倾向密切相关。门阀选官之制既已突破，而鲜卑昔日按年资劳旧的选官法也行之不通，这就为一种新的选官制度——隋唐的科举制的产生，铺平了道路。

魏晋以来，汉封建制度中腐朽成分之二，即鄙薄武事，兵士的身分日益低微，形同厮养，故国家武备不振，外侮屡兴。魏孝文汉化运动，复将此弊病移植于北魏社会之中，遂激起北镇武士的强烈反抗。及至宇文氏创立府兵，革除此弊，恢复鲜卑部落兵制，兵士的地位颇有提高，战斗力大大增强，实开一代新风。杨隋借之，遂能翦灭陈氏，混一宇内。李唐亦承府兵之制，故武功赫赫，声威被于四海。

魏晋以来，汉族地主阶级又陈陈相因了若干迂腐观念：如浮华虚诞、遗落世务，轻视妇女，歧视少数民族的大汉族主义，以汉传统文化之是非为是非，拒绝接受外来文化等等。如前所述，这些陈腐观念都在北朝的鲜卑化潮流中受到冲击和削弱。旧习既除，新机重启，一个更健康强壮，气度恢廓的地主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

综观魏晋北朝汉封建文化与北方草原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则不难发现，鲜卑文化对汉封建文化之冲击、渗透、影响、充实作用，实可谓至深且巨。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之下，相对的历史落后反而表现出相对的历史进步来。这种历史现象，是治史者所不宜忽视的。

在北朝一代漫长的二百余年间，经过两大文化反复的冲突、融炼、筛选，汉封建文化上继汉魏传统文化的精华，又对其腐朽成分有所削弱和抑制，同时又大量吸收了各民族的优秀文化，用

精取宏，汇于一炉而熔冶之，故能别开生面，创立一空前宏伟之格局。光辉灿烂的唐代文化，即出于其中，如旭日东升，喷薄而出。

综观历史，数千年来，中华民族虽历尽劫难，但却能生生不已，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固然有其物质文明作基础，而更重要的是靠中国传统文化这一巨大的精神财富。而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生命力和持久不断的自我更新的活力，则源于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创造之中。在这中间，北朝的鲜卑族及其文化，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注：

本论文原名为《北朝的鲜卑化倾向及其对隋唐的影响》，现改为此名。

作者工作单位：四川大学历史系

